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集刊

NANKAI LINGUISTICS

南开语言学刊

南开大学文学院 汉语言文化学院/合办

2012年

第2期

(总第20期)



商务印书馆

南开语言学刊

Nankai Linguistics

2012 年第 2 期

(总第 20 期)

南开大学

文学院 汉语言文化学院 编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2 年 ·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南开语言学报. 2012年. 第2期:总第20期/南开
大学文学院, 汉语言文化学院编. —北京: 商务印书
馆, 2012

ISBN 978-7-100-09607-2

I. ①南… II. ①南… ②汉… III. ①语言学—丛刊
IV. ①H0-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55310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NÁNKĀI YŪYÁN XUÉKĀN

南 开 语 言 学 刊

2012 年 第 2 期(总第 20 期)

南开大学文学院 汉语言文化学院 编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09607-2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开本 787×1092 1/16

2012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11

定价: 24.00 元

《南开语言学刊》编辑委员会

顾 问 王士元 刘叔新 黄正德
主 编 马庆株 石 锋

编审委员会(按姓氏笔画顺序排列)

王洪君	冯胜利	邢向东	朱庆之	朱晓农	刘丹青
江蓝生	孙茂松	麦 耘	远藤光晓	李行德	李宇明
吴福祥	沈国威	沈家煊	张洪明	张 敏	陆丙甫
岩田礼	罗仁地	罗 端	袁毓林	徐大明	唐钰明
黄 行	曹志耘	储泽祥	游汝杰	蔡维天	潘悟云
魏培泉					

编务委员会(按姓氏笔画顺序排列)

马庆株	王红旗	石 锋	卢福波	李 兵	杨 琳
张文忠	张洪明	周 荐	施向东	郭继懋	曾晓渝
意西微萨·阿错					

执行编辑

冉启斌 王 萍

本刊实行双向匿名审稿制度

目 录

• 特稿 •

赵元任:汉语教学之父	吴星云 1
------------------	-------

• 俗语词研究专题 •

【主持人语】	杨 琳 10
“莫非”源流考	卢烈红 11
“郎当”补说	雷汉卿 22
“棒”与“老板”考源	杨 琳 31
《骑着一匹》俗语词拾零	周学峰 40

• 方言 •

论平江方言的归属	张盛开 44
官话方言古全浊声母的清化	夏俐萍 55
丽江老派汉语方音的历史来源及其演变考释	陈 希 64
泸定县沈村话语音记略	卫 勤 74

• 语音音系 •

普通话阳平和上声的听感分界研究	荣 蓉 85
汉语借词鼻音借入的音系分析	于 辉 96
《声调和语调音系学》评介	洪 薇 106

• 语言教学与习得 •

无声调语言母语者汉语声调特征浮现的实验研究	陈 默 112
傣族人习得汉语普通话单字调的实验分析	蔡荣男、张瀛月 122

• 词汇与辞书 •

古音字表勘误三种(上)	郑张尚芳 129
记录语言实态,服务语言生活——编辑新词语编年本的一些思考	陈 茜 142
“我是看着罗京长大的”的意义层次	宁 聿 9
生理呼吸与语言研究	王毓钧 111
“葩”有“分散”义考证	忻丽丽 147
心中的启明星——深切缅怀胡明扬先生	石 锋 148
沉痛悼念向光忠先生	孔祥卿 159
宋玉柱先生学术研究简介	卢福波 160
<i>Linguistics in China</i> (《语言学文选》)稿约	21
2012 演化语言学国际研讨会召开	30
《语言学译林》(<i>Linguistics Abroad</i>)稿约	43
天津市语言学会暨天津市对外汉语学会 2012 年学术年会召开	63
《南开语言学刊》稿约	105
Abstracts	161

Contents

Feature

Yuen Ren Chao: The Father of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 Wu, Xingyun 1

Special Column on Slang Words

On the Development of “Mofei”(莫非) Lu, Liehong 11

A Supplementary Explanation to the Word

“Langdang”(郎当) Lei, Hanqing 22

Tracing to the Etymology of “Bang”(棒) and “Laoban”(老板) Yang, Lin 31

Notes on Some Dialect Words in *Qizhe Yi Pi* Zhou, Xuefeng 40

Dialectology

The Position of Pingjiang Chengguan Dialect in Modern

Chinese Dialects Zhang, Shengkai 44

The Devoicing Process of the Middle Chinese Voiced Initials

in Mandarin Dialects Xia, Liping 55

The Textual Research on the Historical Origin and Evolution

of Lijiang Old Dialect Chen, Xi 64

A Brief Record of the Speech Sound of Shencun Dialect in Luding

Country Wei, Qin 74

Phonetics & Phonology

The Devoicing Process of the Middle Chinese Voiced Initials

in Mandarin Dialects Rong, Rong 85

Phonological Analysis of Nasals in Chinese Loanword

Phonology Yu, Hui 96

Introduction to *The Phonology of Tone and Intonation* Hong, Wei 106

Language Teaching & Acquisition

- The Experimental Study of the Emergence Process of Tone Features
of Non-Tone Language Speakers Chen, Mo 112
- Experimental Analysis on the Base Tones
in Mandarin Acquired by Dai People ... Cai, Rongnan; Zhang, Yingyue 122

Lexicology & Dictionary

- Three Types of Collation of Ancient Chinese Characters'
Pronunciation Table(A) Zhengzhang, Shangfang 129
- Recording the Real Situation of Language and Serving the Life of Language
—About Editing the New Words Yearbook Chen, Qian 142

赵元任:汉语教学之父

吴星云

提 要 赵元任是举世公认的汉语语言学之父,同时也有长期的汉语教学实践,由此带来的深刻影响,也使他成为汉语教学的前驱——汉语教学之父。赵元任的汉语教学实践历经三个重要历史阶段,在此过程中确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汉语教学理念、原则和方法,建立起一个相对完整而科学的汉语教学体系,对后世影响深远,至今仍焕发生命力。本文尝试对此进行初步探讨,希望能够从一个历史的角度探索汉语教学之路。

关键词 汉语教学 赵元任 传统

○ 引言

谨以此文纪念赵元任先生诞辰一百二十周年。

赵元任(1892—1982)是 20 世纪国际知名的语言学家、音乐家、翻译家,享有“汉语语言学之父”美誉。他在上述学术领域的成就和贡献大多已广为人知并得到公认。然而,很少有人清楚地了解,他在汉语的教学和传播的历史进程中也做过大量开创性工作。尽管我们深知,汉语教学的历史源远流长,且“代有高人,时添利器”(吴宗济,2002),然而,赵元任却是其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位。

回溯历史,可以看到,赵元任不仅有着长达半个世纪的汉语教学实践经验,同时,今天在海内外汉语教学中所通行和被奉为经典的一些基本做法,包括教学的理念、原则、方法、模式、体系等,考究其端,几乎都可以在赵元任那里找到源头。毫无疑问,赵元任对 20 世纪以来的汉语教学产生过重大影响,堪称“汉语教学之父”。然而,正如当代语言学家吴宗济所指出,赵元任多年在海外,“国内对他反而隔阂”(吴宗济,2002),故此,在这个领域人们对他知之不详。从历史的角度去梳理和总结赵元任在此中的特殊贡献,是一个兼具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的课题。这个课题需要探讨的内容很多,但至少应包括这样几个方面:一是详细梳理赵元任汉语教学实践的一生;二是认真总结赵元任的汉语教学思想,包括他的教学理念、原则、方法等,并深入探讨其当代价值;三是在 20 世纪中国社会变革的历史大背景下,进一步讨论赵元任的汉语教学和实践活动在汉语教学发展进程中的划时代意义。

限于篇幅,本文仅尝试具体论述第一个方面,希望通过梳理赵元任汉语教学的一生,初步

探讨汉语教学发展之路。

赵元任的一生是研究汉语的一生,也是教授汉语的一生。汉语研究与汉语教学,如左膀右臂,如经纬二线,构成赵元任的人生主弦。他的汉语教学事业发端于民国时期国语运动,成就于20世纪40年代的哈佛大学,完成于20世纪60年代的伯克利加州大学,大致经历了三个重要的发展阶段,并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一 国语运动时期:推广国语,探索语言教学之路

赵元任的汉语教学实践开始于20世纪20—30年代的国语运动时期。1920年,刚刚结束留美生活的他,回到国内任教于清华大学,此时国语运动正在兴起。国语,也称为标准的“官话”,是民国时期由政府推行全国的汉语标准语,以“国音”为标准,曾经历“老国音”(1920年)和“新国音”(1932年)两个阶段,其中“新国音”以北京音系为基础,“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是一致的”(李荣,1988)。从历史的角度看,国语即普通话,“国语运动”则是发生在民国时期的一场规范汉语的运动。在此期间赵元任主要做了两方面基础性的工作。

1.1 推广国语,推动国语教学

赵元任是当时国语统一筹备会和“数人会”的主要成员,他参与讨论和制定了国语统一标准,并做了大量具体而细致的推广工作,在推行国语上,他“起了示范的作用”(李荣,1988),主要表现是:1)编写《国语留声机片课本》和《新国语留声机片课本》作为推广国语的专门教材,并亲自朗读灌制留声机片,分别于1922年和1935年出版。胡适1922年为该教材出版做了“序”,称赵元任是“天生的方言学家”“音乐家”和“科学的语言学者”,因此,“用留声机片来教学国语,全中国没有一个人比赵元任先生更配做这件事情的了”(胡适,1922)。这期间,根据国语统一筹备会的新规定,1924年赵元任还灌制了另一套采用北京音系的国语留声机片,并编著教程 *A Phonograph Course in the Chinese National Language*, 由上海商务印书馆于1925年出版。这套教材“是给外国人用的”(列文森,2010:102),是用留声机片教授外国人学习国语的“第一次尝试”(Chao,1925),同时,由于在海外发行,“日后很多华侨和华裔都据此学会‘国语’,即现今所称的‘普通话’”(赵新那、黄培云,2001:15)。由此,赵元任开创了用唱片在海内外教授标准汉语(国语)的历史先河。2)创制并推行国语罗马字。国语罗马字,简称“国罗”,是1928年由国民政府正式公布的一套用罗马字母为汉语拼音的方案,赵元任是主要制定者和主稿人,因此该方案也被称为“赵元任式罗马字”。“国罗”废弃了此前国际上通行的威妥玛式拼音方案,“巧妙地用元音和辅音的不同变化兼表了不同声调”(王士元,1983),如 tang 汤、tarng 糖、taang 躺、tanq 烫,“每个音节都有一个让人容易记住的独特的形式”(列文森,2010:110),是迄今为止“唯一不用调号”而拼出四声的拼音系统,(周质平,2008)具有“便于学认,便于书写,便于打字,便于排版印刷”等优点,(赵新那、黄培云,2001:137)因此,赵元任把它视为当时推行国语最有效的工具,在编写课本、创作剧本、讲课、演讲时加以宣传和使用,其后还把它介绍到美国,运用于他在海外的汉语教学中。3)通过各种途径推动国语教学。为了教人们学习

国语,赵元任积极参与各种推广活动。他编话剧并担任导演,“指导咬字和语调”,指导“讲话方面的训练”(赵新那、黄培云,2001:143);他在当时的《国语周刊》上陆续撰文,如《国语罗马字认声调法》、《国语语调》、《方音改国音应注意之点》、《定县方音改国音的注意点》等,指导各地国语教学和学习;1935—1937年,他连续三次在中央广播电台做系列国语广播讲话,“在广播中教中国人标准的官话,覆盖很多省份”(列文森,2010:100);1937年,他为教育部举办的来自全国各地的教师的国语训练班做主讲,培训国语师资。“通过这些途径,他培养了无数的国语爱好者”(苏金智,1999:24)。

1.2 摸索语言教学方法并初步形成理论认识

国语运动使赵元任第一次有机会接触语言教学,作为一个语言学者、一个能说多种语言的语言学习能手,他很快摸索出一些语言教学的基本方法,并初步形成有关语言教学的一些基本认识。这在他的《国语留声机片课本》中有清楚的体现。具体来看,主要有几点:第一,“目见不如耳闻,耳闻不如口读”。这是赵元任在课本自序中开宗明义就提出的基本理念。他主张学语言“必定要自己读出声音来,和耳朵听见的比较起来,才能知道学的好坏,才能有长进的机会”(赵元任,1922),也就是说,学习语言,听和说至关重要。胡适认为“这两句话说尽我们平常用的种种模糊影响的、非科学的国音教学法”(胡适,1922),从教学的角度予以肯定。后来,这一理念也“贯彻于他教授外国学生学习中国语言的过程中”(赵新那、黄培云,2001:119),对海外汉语教学产生了影响。第二,重视发音和声调。《国语留声机片课本》中有两课(第七、八课)专论声调,胡适认为这是赵元任的“最大贡献”,“包含着许多重要的学理”(胡适,1922),关于汉语声调的五度区分法、上声的变调以及轻声等,都在课本中首次提出,不仅弥补了有史以来中国人对四声和变调“始终缺乏科学了解和叙述”的缺憾,“有开创性的意义”(周质平,2008),同时也显示出赵元任在语言教学中对于发音和声调的重视。也正是基于此,后来他把国语罗马字引入到海外汉语教学中,他发现这对教学很有用,“是让外国人掌握中文发音最有效的工具”(周质平,2008)。第三,主张“活用”的语言教学。赵元任特别说明留声机片“所注重的是活用的国语,不是单念的国音字”(赵元任,1922)。这一点胡适也有体会。在课本序中,胡适特别指出,赵元任在“教我们知道‘声’不是呆板的,是活用的;不是用机械的点声符号来死记的,是要随着语言的自然变动的”(胡适,1922),即他的语言教学更关注语言在实际生活中的真实状态。第四,编写教材注意趣味性。赵元任的留声机片课本处处表现出浓厚的幽默,“时时插入一点滑稽的材料”,打破了教科书“传统的沉闷”(胡适,1922)。此后,幽默和趣味作为一贯风格始终保持在赵元任所编写的汉语课本和参考书中。

总体而言,赵元任在国语运动中虽然是教中国人学习普通话,但是他也确实从中积累了关于语言教学的一些普适经验,初步形成了基本的教学理念。1938年赵元任离开中国,这些经验和理念也随之被带到海外特别是美国的汉语教学中,在进一步教学实践中得到检验、丰富和完善,最终形成了一套成熟的汉语教学模式。

二 哈佛时期:创立模式,建立汉语教学体系

从1938年到1947年被聘为伯克利加州大学教授,是赵元任汉语教学实践最重要的十年。

其间他在美国多所大学任教,研究并讲授汉语,有更多的机会从中西语言比较的角度深入思考汉语教学的有关问题,从中摸索并创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汉语教学模式,建立起一个比较完整的汉语教学体系,为此后美国的汉语教学树立了典范。这期间,他在汉语教学方面的工作主要反映在三个侧面:

2.1 积累了丰富的海外汉语教学经验

赵元任接触面向西方人的汉语教学,始于1921—1924年在哈佛大学短期访学期间,他被聘为哲学和中文教师,开了两年中文课(1922—1924)。虽然只有3个学生,却是他海外汉语教学的初步尝试,他自己动手编写适合的课本,“使用地道的北京音来作为标准音”,并按照先口语次书面语再文言文的顺序组织教学,在上课时,他让学生“大声朗读课文”(列文森,2010:148—149),做大量口头练习。1938年赵元任再次赴美后,开始“把主要的精力放在教西方人中文上”(列文森,2010:169)。这期间他的主要教学经历包括:1938—1939年在夏威夷大学教中文阅读;1940—1941年在耶鲁大学开设中文阅读课和粤语课;1942—1946年在哈佛大学教粤语、汉语方言,并主持美国陆军中文训练班,负责项目所有课程设计和教学,担任大班老师,教汉语口语,训练中文助教,编写教材等。在教学过程中,他对教学方法进行了更为严谨的思考和大胆的实践,如在夏威夷大学时,把文言文当成活的语言来教,课堂上“用了很多口头练习”,甚至“亲自跟学生用文言文示范对话”,叫学生用文言文做作业,“而不只是把中文翻译成英文”。(列文森,2010:169—170)他的教学对象既有西方人,也包括有广东话背景的华侨子弟,在针对华裔和非华裔学生的汉语教学上,他也有不少积累。可以说,他是那个时代少有的经验丰富并且能力全面的海外汉语教师。

2.2 创建一套行之有效的汉语教学模式

1943年8月,哈佛大学接受美国陆军委托举办中文和日文训练班,简称ASTP项目,训练服务于太平洋战场的口译人才。赵元任在其中担任中文训练班主任,具体主持了1943年8月至1944年12月共两期的训练班教学工作,即FE-1和FE-2(远东-1、远东-2),每期学员约100人,学习限期均为10个月。从学员数量来看,这是哈佛大学有史以来第一次举办这样大规模的中文训练班,在没有任何经验可资借鉴的情况下,赵元任成功组织了教学,出色完成了训练班的全部工作,并由此探索和创建了一套全新的汉语教学模式,为北美提供了一个汉语教学的基本范式,影响至为深远。这个教学模式的主要做法是:1)在课程设计方面,按照大小班形式实施教学。大班课负责讲解,由赵元任担任,小班课(9—10人一班)负责训练,由助教(informants)担任。2)在教学管理方面,建立助教选聘、轮班和指导机制。由于学员多,急需中文助教,赵元任决定在哈佛大学、Radcliff College和麻省理工学院的中国留学生及家属中寻找,条件是“凡是国语说得好的”(杨步伟,1987:387),才能通过哈佛大学正式聘请。最后他按照师生1比10的比例,配备了“差不多十个”助教(列文森,2010:182),著名汉学家杨联陞、新中国第一代对外汉语教学专家邓懿等当时作为他的学生,也在助教之列。在教学上,他采用助教轮班(rounded up)上课的做法,并进行及时指导,“定期召集助教一起研究并指导小班教学”(赵新那、黄培云,2001:271)。3)在教学方法上,采用当时世界语言教学领域正在兴起的听说法和直接法。每天除1小时大班课用英文讲解外,余下时间学员听课文录音,或上小班课,

“由助教采用直接法训练学员的听说能力”(赵新那、黄培云,2001:269),想方设法让学员多听多说。4)课堂教学与课外实践密切结合。ASTP 项目每天上课约 6 小时,接着有大量语言实践,每个人都要练习,例如自编自演短剧,小组聚会等,部分学员甚至办了一份完全用汉字的中文报纸《大私报》。

最终,经过近 10 个月的密集式教学,两期训练班均达到项目要求的目标,“大家进步之速都出人意外”(杨步伟,1987:388),以中等学员的能力,在日常生活话题上已经可以做到“自由表达”,“跟别人自由交流”,并且“别人完全能够听懂”(列文森,2010:183)。训练结束后,一些人当了口译人员,也有人进入美国国务院,还有一些人最后成了“顶尖的汉学家”(列文森,2010:182),如牟复礼(Frederick Wade Mote)、柯迂儒(James Crump)分别成为普林斯顿大学、密歇根大学的著名教授,还有 Jerald Stryker,后来是“美国之音”主任。显然,通过这个教学模式,赵元任只用了较短的时间,就卓有成效地培养了“成批”能够承担中美政治文化交流工作的“中国通”,这在当年堪称“创举”。

2.3 建立起一个相对完整的汉语教学体系

通过这一阶段在多所大学的汉语教学实践和取得的经验,赵元任逐渐将当时的汉语教学推向体系化和规范化,一个相对完整的教学体系开始出现并成形。总体来看,这个体系主要从教师、教学和教材三个方面为当时的汉语教学提供了基本保证。1)从教师方面来看,赵元任的贡献主要是确立了一个能有效培训汉语教师的保障机制,他在 ASTP 项目中选聘和指导助教的做法,以大班老师督导小班老师的成功经验,以及课程组(team work)集体备课的教学机制,为当时海外汉语教学的师资培养提供了有益的参考。2)从教学方面看,赵元任设计了一套相对完整的汉语课程体系,在大小班的区分、讲解课与训练课的配合、课堂教学与课外语言实践的结合,以及教学方法等方面,都有深入的思考和成熟的想法,并形成了制度。3)在教材方面,他做了许多有益的尝试,一边上课一边编写教材,并最终在 ASTP 训练班课程的基础上编写了《粤语入门》(*Cantonese Primer*)和《国语入门》(*Mandarin Primer*),分别于 1947 年和 1948 年出版。其中,《国语入门》是继《国语留声机片课本》后,赵元任最有代表性的汉语口语教材,这本教材“根据直接法原则编写”,“同时体现了结构法的许多特点”,充分展现了他在汉语教学上的基本理念、原则和方法,出版以后“在美国汉语教学中占重要地位”(盛炎,1987)。此外,他与杨联陞合编了一本汉英口语词典《国语字典》(*Concise Dictionary of Spoken Chinese*),也在 1947 年面世。这表明他已经有了为汉语教学编写系列教材和参考书的想法和计划,并已开始着手进行。

对于语言学家赵元任而言,这一时期是他汉语教学工作最为频繁的阶段,也是他把语言教学做得最为有声有色的阶段。从教学中,他检验并丰富了从 20 世纪 20 年代就逐渐形成的汉语教学理论,并通过一套教学模式和教学体系固定下来。正如当代学者冯胜利所言,哈佛大学的中文教学正是从赵元任主持 ASTP 项目时开始其“现代化的里程”的(冯胜利,2008),而这个现代化,应该不仅仅指哈佛。

三 伯克利时期:总结理论,著书立说

1947年,赵元任结束在哈佛大学的聘期,转入伯克利加州大学担任东方语言系(Oriental Language Department)中文和语言学教授,直至退休。在伯克利,赵元任继续从事语言研究和教学工作,担任多门汉语语言学课程,带研究生,培养了又一批国际上知名的汉学家,如丹麦的易家乐(Søren Egerod)、瑞典的安吾乐(Olav B. Anderson)、挪威的韩恒乐(Henry Henne)等。他长期教中文课,主要是国语课和粤语课,当时选他的课的学生每学期数十人,“通常都非常活跃并且兴趣浓厚”,还有一些广东人后裔,“也想学国语”(列文森,2010:197)。1963年5月24日,赵元任71岁,“上在加大的最后一课”,“课后跟全班照相”(赵新那、黄培云,2001:401),正式离开汉语课的教学一线。从20世纪20年代推广国语到60年代离开课堂,赵元任的汉语教学生涯持续了近半个世纪。

尽管退了休,课堂教学不得不中止,但赵元任的汉语教学事业还在继续,这一时期他做了一项更为重大的工作,这就是勤勉于著书立说,把一生在语言学和语言教学上的研究、经验和思考加以最后总结,形成更完善的理论,以一系列专著的形式出版问世。其中与汉语教学相关的专著主要是《中国话的文法》(*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 1968年)、《中国话的读物》(*Readings in Sayable Chinese*, 1968年)、《语言问题》(1959年台湾大学印行,1968年台湾商务印书馆再版,1980年北京商务印书馆又版)和《我的语言自传》(1971年在台湾“中研院史语所集刊”第43本上发表)。从这些代表性著作中,可以清楚地观察到赵元任的汉语教学理论体系,这个体系具备三个基本维度,从物理学角度,如同一个相互支撑、多面立体的“三维空间”,完整和谐地组成一体:1)在语言理论上,由于《中国话的文法》的问世,汉语教学领域有了一个可以依据的完整的现代汉语口语语法体系。《中国话的文法》是赵元任“写了给外国人研究中国话用的”(赵元任,1979),也是他一生汉语教学实践和科学研究的结晶,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积累,其间“做札记、收材料,跟同行的人讨论问题”,直到1968年才最终完成并正式出版,是一本“体大思精”(丁邦新,1994:455)的巨著。在书中,赵元任首次运用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研究方法描述汉语语法,“方法谨严,系统分明”,无论从“立论的深度”还是“影响的广泛”,“都是最重要的汉语语法著作之一”,(李荣,1988)也是“当时国外最完整、最系统的一部汉语语法书”(盛炎,1987)。1979年,此书由吕叔湘译成汉语,以《汉语口语语法》为名,由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在中国大陆引起了巨大的反响。2)在语言教学上,通过《语言问题》、《我的语言自传》等,赵元任进一步总结和阐明了一套完整的汉语教学理论。例如《语言问题》第十一讲专论“外国语的学习和教学”,从学习者的角度阐明语言教学应该教什么和怎么教这两大基本问题,集中体现了赵元任的汉语教学理念和原则。3)在教材方面,《中国话的读物》的出版,标志着一个完整的汉语教材系列的最终完成。《中国话的读物》(全套三册)是一套为高年级学生编写的“学说中国话的教材”(赵新那、黄培云,2001:435),它与早年《新国语留声机片课本》(包括汉字本、国语罗马字本和唱片)、20世纪40年代的《国语入门》(包括汉字本、国语罗马字本和唱片),构成了一个从口语教材到阅读教材,从初级教材到高级教材的完整系列,加上《中国话的

文法》和《国语字典》，最终构成一个包含汉语课本、教学参考书和工具书的完整教材体系。

除了著书，赵元任也一如既往地关心着汉语教学在各地的发展。作为一位教学上的前辈，他常常被各地学校、学术机构邀请参加研讨会，并做报告或者演讲。如1967年秋季，他参加了普林斯顿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センター题为“中文教学中的内容和形式问题”的讨论会，在会上做了较长的发言（赵新那、黄培云，2001：432）；1968年7月，他在旧金山州立大学做了三次关于中国语言的报告，听众多数是中文教师（赵新那、黄培云，2001：439）；1970年10月，应邀到弗吉尼亚大学和俄亥俄州立大学做学术演讲，讲《我的语言自传》等。他对语言教学的关心不限于美国境内，1959年2月至4月，他应邀赴台湾大学做《语言问题》系列演讲，从第一讲开始，“听众出乎意外地多”（赵新那、黄培云，2001：361），在此期间还到台湾省立师范大学讲《外语教学的方式》，到侨园给当时在台湾学习中文的海外学生讲《中国语言在海外的情形》等；1968年9月访欧期间，还访问了英国爱丁堡大学中文系，与系主任谈论语言教学问题（赵新那、黄培云，2001：442）；1973年阔别多年后回国访问，受到周总理接见，也谈到国外中文教学问题（赵新那、黄培云，2001：482）。他对于汉语教学事业的热忱，可以说世界有目共睹。

四 对汉语教学发展的深远影响

赵元任倾其一生所进行的汉语教学实践，对此后海内外的汉语教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美国，他所创立的卓有成效的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不胫而走，逐渐影响全美，成为此后北美汉语教学奉行的经典，“影响了几代人的中文教学”（冯胜利，2008），由此推动了20世纪，特别是“二战”以后海外汉语教学的发展。同时，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改革开放，随着汉语教学在21世纪的蓬勃发展，他的模式和方法也被进一步介绍到国内，引起国内的关注和兴趣。大体而言，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赵元任在汉语教学上的影响主要经历了两个重要的历史阶段。

4.1 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

这一阶段可以称为“赵氏模式”在北美的推广期。由于“常春藤”大学的推动，其教学模式逐渐成为北美汉语教学界的主流，影响力至今不衰。赵元任一生大部分时间执教于美国各大名校，如康奈尔大学、耶鲁大学、哈佛大学、加州大学等，并在其中大部分学校讲过汉语课，对这些大学的汉语教学发展有很大影响，20世纪50年代，他的汉语教学模式及其方法很快被这些“常春藤”大学学习和借鉴，并向全美推广。

在这方面，普林斯顿大学堪称代表。1956年，曾经从哈佛大学ASTP项目FE-1班毕业的学员牟复礼（Frederick Wade Mote）受聘为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进入成立不久的东亚系，从此，东亚系“在初级中文教学上，无论是教材还是教法，都采用赵元任模式，并大力推广”（周质平，2008）。20世纪60年代中期，普林斯顿大学在北美著名的明德暑期语言学校开办中文暑期班，把赵元任模式引入明德中文教学，从那时起，经过近50年的发展，这一模式在明德得到继承发扬，得到不断完善，最终形成著名的“明德模式”，影响更广。

这期间，赵元任的教学模式逐渐在北美各地生根，并得到丰富和发展，特别是一些以教学效果显著而见称的中文项目，几乎都能从中找到赵氏模式的影子，可以说，他的模式几乎见证

了 20 世纪 50 年代至今整个北美汉语教学的成长。

4.2 20 世纪 80 年代至今

这一阶段是“赵式模式”开始引入国内并产生影响的时期。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中断已久的对外汉语教学工作恢复正常,国内开始重新接待来自世界各地的留学生。80 年代,国内众多院校逐渐开办留学生短期教育和进修教育,欧美学生人数也在持续增长,并开始出现中外合作举办的汉语暑期班项目。例如明尼苏达大学、加州大学等美国高校从这段时期开始,每年组织暑期班到中国高校学习,为期 6 至 10 周不等,由此带动了更深层次的汉语教学交流。20 世纪 90 年代,出现了完全按照北美的教学体制开办的暑期班项目,在这些暑期班项目影响下,赵元任的教学模式和方法开始被介绍到国内。

1992 年,普林斯顿大学与北京师范大学合作创办“普北班”,在国内开办每年约 120 个学生规模的全浸式汉语暑期班项目,并由普林斯顿大学周质平教授担任项目主任。从 1993 年开始,“普北班”在教学理念、教学方法、教师选聘、课程设置、教学管理等诸多方面,一律沿用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做法,同时也是赵元任当年所开创的做法,取得了很大成效。随着“普北班”的成功开办,北美众多大学也相继在中国开办汉语暑期班,如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威斯康星大学、西北大学、密西西比大学,美国多所大学联合举办的 ACC 项目、CET 项目、明德暑校在北京、杭州、云南等地开办的分支项目等等,项目名称各异,负责的领队不一,国内合作院校也有不同,但采用的教学模式却几乎是一致的,即使在一些具体的做法上存在些微差异,但在教学方法、教学管理、课程设置等基本的方面,可以称为赵元任模式的当代翻版。由此,国内对外汉语教学界开始了解并熟悉这一模式,并把它统称为“北美模式”。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北美模式”在国内汉语暑期班项目中取得了很大成功,教学效果显著,不仅培养了大批能把汉语说得字正腔圆,并对中国文化有深入了解和持续兴趣的欧美学子,同时还在其严谨严格的教学管理机制培养下,成长起来一批熟悉这一模式,能够在汉语课堂教学中独当一面的青年师资力量。其影响逐渐引起国内关注,不少人开始从理论上对这一模式进行研究和探讨,同时,一些院校也开始学习和借鉴其有益经验并进行教学尝试。

回顾历史,反观当今,有一个印象是深刻的:无论笼统如“北美模式”,具体如“明德模式”“普北模式”“ACC 模式”等等,追根溯源,可以说都是赵元任所开辟的传统。这个传统绵延至今,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究其原因,与赵元任当年所打下的坚实的教学理论基础有关。

赵元任是语言学家,但是他也用一生从事着汉语教学。他的汉语教学几乎贯穿整个 20 世纪,同时又兼跨大洋两岸,具有“穿越世纪,横跨东西”的恢宏气魄,为后世树立了一个汉语教师的典范。他既研究语言,也传播语言,是著名学者季羨林眼中中国少有的“龙虫并雕”的学者,“讲理论,他有极高深坚实的理论。讲普及,他对国内,对世界都做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季羨林,2007)。他善于把研究与教学相结合,因此,能从科学的角度总结教学的方方面面,寻找教学的最佳途径,为汉语教学确立了一套基本的教学理念、原则和方法,虽历久而弥新,对 20 世纪以来的汉语教学产生了深远影响。他的教学理论“反映了汉语教学的基本规律”(盛炎,1987),因此,值得我们仔细梳理,认真总结和深入研究。

冯胜利	2008	《海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的新课题》,《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第1期。
胡适	1922	《国语留声机片课本·序》,上海:商务印书馆。
季羨林	2007	《赵元任全集·总序》,北京:商务印书馆。
李荣	1988	“赵元任”,《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美]罗斯玛丽·列文森	2010	《赵元任传》,焦立为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盛炎	1987	《赵元任先生对汉语教学的贡献》,《语言教学与研究》第3期。
苏金智	1999	《赵元任学术思想评传》,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苏士元	1983	Yuen Ren Chao, <i>Language</i> 59.3:605.
吴宗济	2002	《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集·序》,北京:商务印书馆。
杨步伟	1987	《杂记赵家》,长沙:岳麓书社。
赵新那、黄培云	2001	《赵元任年谱》,北京:商务印书馆。
赵元任	1922	《国语留声机片课本》,上海:商务印书馆。
——	1979	《汉语口语语法·序》,吕叔湘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	1994	《中国话的文法》,丁邦新译,台北:学生书局。
周质平	2008	《对外汉语教学史上的赵元任》,载《第九届国际汉语教学研讨会论文选》。
Yuen Ren Chao	1925	<i>A Phonograph Course in the Chinese National Language</i> . 上海:商务印书馆。

“我是看着罗京长大的”的意义层次

宁 聿

“我是看着罗京长大的”有三个意思：A.“我目睹了罗京长大成人”，B.“我目睹了罗京播报新闻越来越成熟”，C.“我伴随着罗京播报的新闻长大成人”。产生歧义的原因有：结构的语法关系、“长大”的意义、“罗京”的意义。表达 A、B 义时是兼语结构，“罗京”既是“看”的宾语又是“长大”的主语；表达 C 义时是连动结构，“我”既是“看”的逻辑主语，也是“长大”的逻辑主语；表达 A、C 义时，“长大”的意思是“长大成人”，而在表达 B 义时，“长大”的意思是“成熟”；表达 A 义时，“罗京”指叫这个名字的人；而表达 B、C 义时，“罗京”不是指罗京本人，而是转指罗京播报的新闻。“我是看着罗京长大的”的意义层次如图所示：

我是看着罗京长大的 { 兼语结构 { 我目睹了罗京长大成人
我目睹了罗京播报新闻越来越成熟
连动结构: 我伴随着罗京播报的新闻长大成人

• 9 •